

历史文化卷

華夏文明在甘肅

主 编 ◎ 刘 基
副主编 ◎ 刘再聪

(下)

人民出版社

历史文化卷

華夏文剛在甘肃

連新著



(下)

主 编 ○ 刘 基
副主编 ○ 刘再聰

责任编辑:史 伟 吴继平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文明在甘肃.历史文化卷:全2册/刘 基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1995-3

I. ①华…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史-甘肃省 IV. ①K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2627 号

华夏文明在甘肃

HUAXIA WENMING ZAI GANSU

历史文化卷:全2册

刘 基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4.25

字数:62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995-3 定价:92.00 元(上、下)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下)

第八章 敦煌遗书	313
第一节 敦煌遗书的发现和流散	313
第二节 敦煌宗教遗书的内容和价值	318
第三节 敦煌遗书中的儒学经典	326
第四节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类著作	331
第五节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	340
第六节 敦煌写本学探微	348
第九章 长城文化	358
第一节 甘肃长城的修筑技术起源及著名遗迹	358
第二节 甘肃战国秦长城及秦朝长城	368
第三节 甘肃汉长城与明长城	380
第四节 甘肃长城的辅助系统及繁多类型	391
第五节 甘肃长城文化	401
第十章 石窟文化	412
第一节 石窟起源	413
第二节 甘肃石窟分布	417
第三节 甘肃石窟艺术	427
第四节 甘肃石窟的时代特征及艺术价值	438
第五节 蓬勃发展的甘肃石窟文化	446
第十一章 丝绸之路文化	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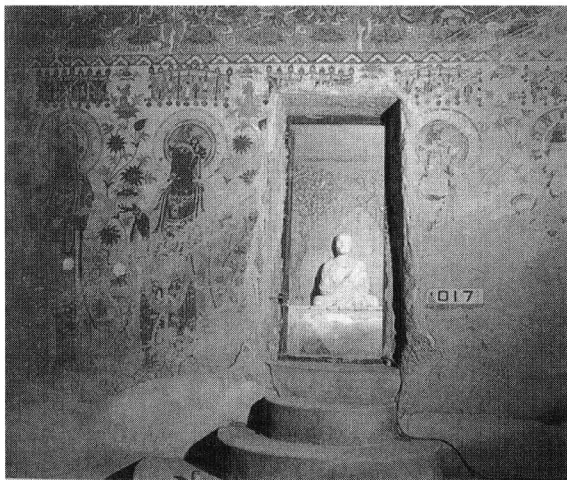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长安至武威段里程及重要遗迹·····	453
第二节 武威至敦煌段里程及重要遗迹·····	466
第三节 甘肃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镇·····	480
第十二章 西夏文化 ·····	485
第一节 西夏统治与经营河西地区·····	485
第二节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499
第三节 河西儒学教育与文学艺术·····	507
第四节 科学技术·····	520
第五节 民风习俗·····	526
第十三章 民族文化 ·····	534
第一节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西北各民族及其文化·····	535
第二节 隋唐时期兴起的突厥、回纥、吐蕃诸族及其文化·····	547
第三节 元明清时期的西北各民族及其文化·····	555
第十四章 宗教文化 ·····	575
第一节 道教·····	575
第二节 佛教·····	584
第三节 伊斯兰教·····	597
第四节 基督教·····	610
第十五章 黄河文化 ·····	618
第一节 河源文化·····	619
第二节 黄河地质文化·····	627
第三节 黄河岩画·····	632
第四节 黄河上游的航运及水利开发·····	638
第五节 黄河上游的渡口与交通·····	658
小 结·····	670
主要参考文献·····	671
后 记·····	680

第八章 敦煌遗书

第一节 敦煌遗书的发现和流散

1925 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做了一次学术演讲,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他说: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者有三:一为孔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案,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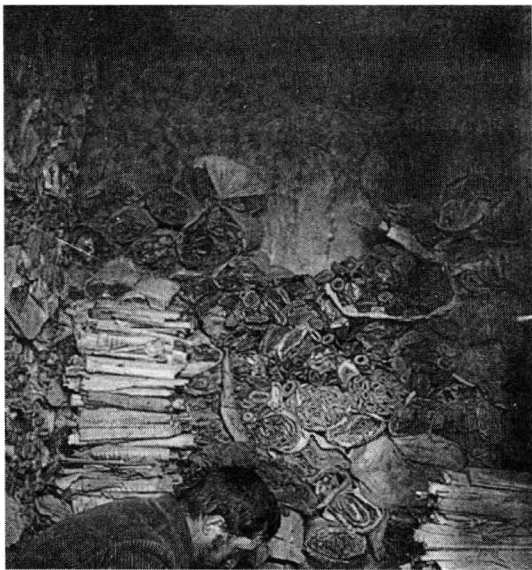
莫高窟第 17 窟——藏经洞

王国维所讲的“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案”,就是后被学术界广为称道的“近代中国学术之四大发现”。现在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清府档案都成显学,成为 20 世纪中国学术重要的增长点。

而就涉及的学术面之大,研究者之多,波及的国家和地区之广而言,敦煌学首屈一指。

1900年6月22日,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莫高窟今编号16窟甬道北面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约10平方米、高2米多的石窟,俗称藏经洞,今编号17窟。里面几乎堆满了写卷(少数刻经)、绢画、纸画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发现。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被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掠夺、国家积贫积弱的时候,而英、法、俄、美等国家的所谓考古探险正集中在中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

由于敦煌当地官员不断地把藏经洞藏品赠送给上级,这就给当时正在新疆的外国探险家提供了信息。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敦煌,用欺骗和贿赂的手段买通王道士,运走了一大批敦煌遗书,加上他1914年又一次从王道士手中骗得的文书,合计劫得汉文文书约13600件,吐蕃文、梵文、佉卢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突厥文、回鹘文等文字的文书约2000件,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挑选文书

此外还有绢画、纸画等艺术品。这些文书和艺术品大部分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共15册(1990~2005),外加目录索引一册,收录了S.00001—S.13677号中所有汉文佛经以外的文书。图版比较清晰,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2011年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书预计出版100到120册,已出版了10册。

1908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骗得文书

7000 多件。其中汉文文书 4000 多件,吐蕃文、梵文、焉耆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书 3000 多件,此外还有绢画、纸画及丝织品。伯希和虽比斯坦因晚一年到莫高窟,但由于他精通汉文及一些西亚文字,又得到王圆箎的同意进入藏经洞进行挑选,所以他得到的文书都是莫高窟藏品中的精华。这些敦煌遗书后来都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2005 年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共 34 册,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伯希和劫去的敦煌汉文文书。

1910 年,劫余的敦煌遗书由莫高窟运送北京。一路上除了押运者送人、被盗、遗失外,到北京后,押运负责人新疆巡抚何彦升纵容其子何震彝将敦煌遗书拉到自己家中,伙同其岳父、著名版本文献学家李盛铎窃取了其中数百卷精品。最后送到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有近 14000 多件。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北京图书馆又多方收藏了数以千计的敦煌遗书,使其藏品总数达到 16000 余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 2005 年开始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计划出版 146 册,已出版 142 册。

1912 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来到中国西北探险(第一次在 1902 年,第二次在 1908 年,这两次都没有到敦煌),队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同时到了敦煌会合,从王道士手中买到一批文书。吉川小一郎于 1914 年又从新疆返回敦煌,也搞到了一批文书。这两批劫得的文书数量不是很清楚。后来又流散到中国东北、韩国汉城(首尔)和日本京都等地。流散到中国东北的那一部分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旅顺博物馆转交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流散到汉城的那一部分今藏在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藏的敦煌遗书收藏比较零散,主要收藏单位有龙谷大学、大阪杏雨书屋、大谷大学、东京大学、三井文库、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藤井氏有邻馆、天理图书馆、大东急纪念文库、奈良唐昭提寺、国立国会图书馆、宁乐美术馆、东京女子图书馆、佼成图书馆、九州大学等,还有一些在私人手中。日本收藏的敦煌遗书在 1000 件以上,其来源除了大谷探险队所劫取的以外,还有何彦升、李盛铎监守自盗后倒卖给日本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购得的。

俄国人奥登堡曾率领探险队于 1906 年和 1914 年两次到中国西北

“科考”。第二次来华期间,奥登堡曾来敦煌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考察活动,包括为莫高窟绘制平面图,为所有洞窟编写目录提要,拍摄图片等。他们也获得了大量的敦煌遗书,其具体数量不详,今俄罗斯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19000余件,其中主要部分应当是奥登堡劫取的。因为当时他们还对藏经洞的垃圾进行了彻底清理,筛选出了数以千计的文书碎片。《俄藏敦煌文献》共17册,1992~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10年,虽然甘肃地方政府对莫高窟的藏品进行了清理和运送。但王道士事先私自转移隐藏了很多精品。所以后来斯坦因、奥登堡、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诸多精品。1919年,甘肃省教育厅又一次组织人力对莫高窟进行了清查,获得了大量的吐蕃文书和一部分汉文文书。其大宗运往省城兰州,现存甘肃省图书馆。其余部分现藏于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以及河西地区的有关文化单位。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藏敦煌文献》共6册,甘肃珍藏的敦煌汉文文书收罗殆尽。

敦煌遗书面世后,除了英、法、俄、日及运送北京的大宗外,还有数量不少的文书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国内和世界各地,收藏在9个国家的7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及一些私人手中。其精确的数字很难核查。近若干年出版的较大规模的影印本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1册(石门图书馆公司1976年版),《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1993),《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1995),《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1996~1998),《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1999,以上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浙藏敦煌文献》1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等。

敦煌遗书流散世界各地,这是中国学术的大不幸。但是,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而西方国家在保护敦煌文献方面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值得我们去借鉴。我们聊感欣慰的是,这些流散国外的珍贵文书,并没有受到人为的损毁。同时,我们也应当反思,敦煌遗书发现之初,中国的学人并不是毫无知情,但几乎都对敦煌遗书的抢救、保护毫无作为。敦煌、酒泉的官员大约在发现的当年或次年已经得

到王道士的赠品。1904年,甘肃学政叶昌炽视学酒泉,得到了敦煌地方官员赠送的诸多藏经洞遗物。《缘督庐日记钞》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九月初二日、九月初五日皆有相关记录。九月初七日的日记,还记载了藏经洞发现的经过:“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泥丸,砉然扃鐍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然而近在咫尺的叶昌炽,竟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学术敏感和责任去一趟敦煌,了解一下藏经洞的情况,与这么重大的发现失之交臂。

1909年,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卷到北京,展示给中国学者观赏。此消息很快传到已辞官归隐苏州的叶昌炽,他深感悔恨。《缘督庐日记钞》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午后,张闇如来,言敦煌又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去,可惜也。欲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即汪宗翰,时任敦煌知县)。”十二月十三日又记:“午后,张闇如来,携带《鸣沙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洞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氏经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华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到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叶昌炽到了酒泉,已经听说藏经洞发现一事,并且已见到了一些藏品,但他也未能再向前一步探个究竟。而1909年在北京观看了伯希和藏品的学者们,也只是在天国的京师扼腕愤慨,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到敦煌石室亲自看看。和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在中亚和新疆的沙碛中出生入死的情形相比,确不可同日而语。

敦煌遗书的抄写年代,根据抄卷上保存的题记,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譬喻经一卷》,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迄。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愿蒙解脱,生生敬信三宝,无有退转。”英藏S.4358卷,抄写有《李相公叹真身(首题)》,是根据宋仁宗的《佛牙舍利赞》改编而成。史载《佛牙赞》为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创作,这是迄今为止可确知的敦煌遗书的最晚年代。这就是说,近6万件敦煌遗书时间跨度长达7个世纪。

敦煌遗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章将重点介绍汉文文书的主要内容。按照古代学术分类,敦煌遗书中经、史、子、集四部的文献都有。尤其可贵的是,一些官府或寺院的档案资料,下层民众的生活应用文、宗教应用文,都是传统典籍中没有的。按照现代学术分类,敦煌遗书除了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典籍外,还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其他宗教、文学、语言学、体育学、管理学、医学、科技等方面的内容。这里重点介绍宗教典籍、历史资料、文学资料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和价值。

第二节 敦煌宗教遗书的内容和价值

一、敦煌佛教典籍的内容和学术价值

丝绸之路为古代中国连接西域和中亚的交通要道,而敦煌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敦煌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也是中古时期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欧洲文化,以及由这四大文化孕育的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的荟萃之地。根据敦煌所出文书记载,莫高窟是乐傅法师于公元 366 年开凿的,当时敦煌在前凉张氏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数十年,敦煌人竺法护就在敦煌本地翻译佛经,同时著名的书法家索靖曾在莫高窟题壁“仙岩”,说明乐傅之前莫高窟一带已有繁盛的佛事活动。到了后来,尤其是隋唐以来,敦煌更成了佛教圣地,大量的西行求法者和西域高僧途经此地,或长驻这里讲经说法,大量的中原抄经供养于莫高窟的各个寺院。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三界寺,就汇聚了众多的佛经。

根据王重民先生的统计,敦煌遗书中的佛经抄卷中,数量最多的是隋唐时代最流行的 5 部大经,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维摩诘所说经》。到了唐代末年,《妙法莲花经》中的第二十五品《观世音经》和伪经《佛说无量寿宗要经》(亦称《大乘无量寿经》)在敦煌特别流行,写本就很多。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藏品中就有 2100 多个写卷,



用布包裹的敦煌写卷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两处有 1400 多卷,《金光明最胜王经》两处有 800 多卷,《妙法莲花经》两处有 2500 多卷,《维摩诘所说经》两处有近 700 卷。根据唐代大藏经目录《开元录》,当时一部完整的大藏经具备佛典 1076 部,5048 卷,而藏经洞中属

于《开元大藏》已收的佛典只有不到 400 部,可见藏经洞中的佛经并不是系统的佛教大藏。

敦煌佛教典籍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敦煌写经是写本时代的产物,保存着佛籍翻译初期的面貌,可以校勘宋代以后开雕的各种大藏经。中国的校勘学萌芽于先秦,成熟于清代。而清人所谓“善本”,首要条件是古本。敦煌佛经的写本时代,从公元 4 世纪到 11 世纪初。其中北魏时代的写本非常宝贵,而隋唐时代经过精心校对过的写本,更是抄写精良,校勘谨严,减少了许多后代辗转翻刻产生的讹误,因而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方广钊在《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简目》一文中曾说过:“传统大藏经虽然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曾多次经过校勘、订正,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我本人就曾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传统大藏经本文意窒碍处,用敦煌遗书本一对照,立即文从字顺。”

第二,敦煌写经中存在不少的古佚经,可以补足宋以后各藏的不足。所谓古佚经,即在佛教史上通行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失传的典籍。现在敦煌写经中发现了这些佚经,对于治佛教史的人来说,当然非常重要。早在 20 世纪初期,当敦煌劫余的文书运送到京师图书馆的时候,我国佛教史专家李翊灼先生就遍阅了 8000 多个写卷,从中选出了 159 种古佚经,编成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并附有《疑伪外道目录》。日本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利用英法和日本所藏敦煌写经,校订出了 188 种古佚经,编入《大正藏》第 85 卷的《古逸部》和《疑似部》。近二十年来,我国著名学者方广钊主编有《藏外佛教文

献》，已经出版了16辑，取材大多数就是敦煌写本。

第三，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量不少的佛教史料，可以利用这些史料研究佛教史上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佛教中的三阶教，是北周僧人信行创建的佛教宗派，初唐时期达到鼎盛，大约在这个时期传到敦煌一带。由于其理论与实践都与传统佛教有较大差距，所以引起传统佛教的反对。从武则天到玄宗时，多次遭到禁毁，其典籍大都散佚。三阶教的史料，虽说在石刻文献或其他文献中保存了一些，但很零星。敦煌遗书中的三阶教典籍，使我们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可以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佛教史上这一重要的宗派。如《三阶佛法》卷第二(S.2683)和第三(P.2059)，还有《三阶佛法蜜记》卷上(P.2412)、《三阶佛法发愿法》(S.1306)、《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1卷(S.2423)等。通过敦煌遗书的三阶教写卷，加上日本寺院保存的相关史料，三阶教的基本情况越来越清楚。过去学术界说中国佛教有八派，现在加上三阶教，应当说中国佛教有九派。没有敦煌遗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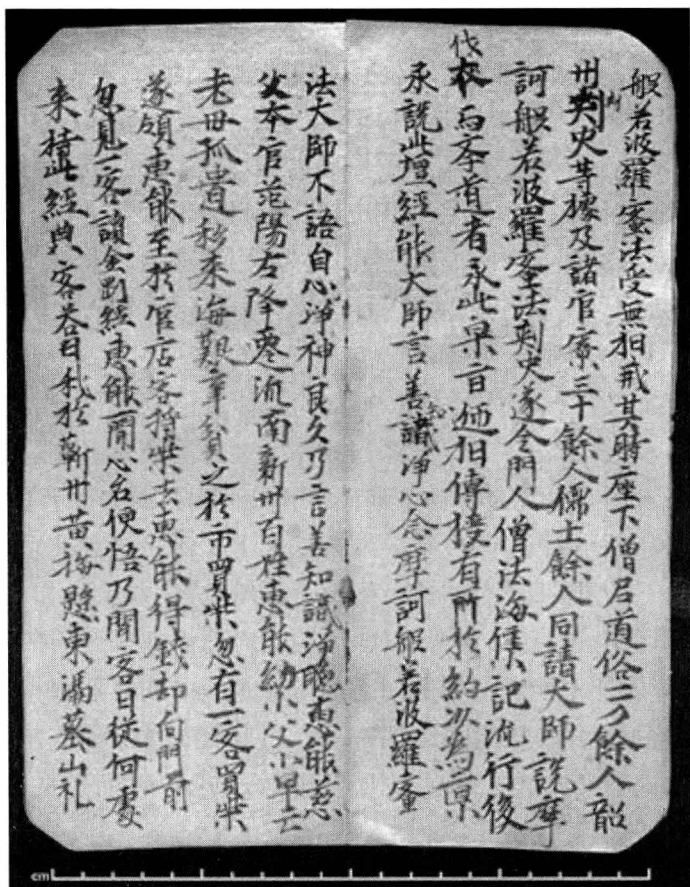
佛教中国化产生的天台、云门、禅宗三大派别，以禅宗最为重要。但早期禅宗的经典，大多已经散佚。过去我们对禅宗的了解只能依照《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宋代僧人对本宗历史的解释。敦煌禅宗资料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敦煌遗书中有禅宗史上最早的史书——净觉的《楞伽师资记》和杜朮的《传法宝纪》，有《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慧能弟子神会(684~758)与北宗辩论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语录。这些材料对于我们了解早期禅宗史和南北二宗争论的情况都大有裨益。除此，还发现有反映北宗神秀思想的一些史料，如《观心论》、《大乘五方便》等。南能北秀之思想在敦煌遗书中皆有发现。而且禅宗史上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沉没在历史泥沙中，已无人知晓，而敦煌禅宗史料让他们重新浮现于世。

关于敦煌遗书中的相关史料对早期禅宗研究的意义，我们举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研究为例。胡适是一个学术知觉非常敏感的学者。早在1924年，胡适在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帮助下查阅敦煌文献，正式开始了敦煌学研究。其中最让他关注的就是

早期禅宗的史料。而他研究视野中确立的早期禅宗史上的中心人物是菏泽宗大师神会。胡适在巴黎、伦敦所藏的敦煌卷子中,发现了神会语录及神会所作的《顿悟无生般若颂》(即《显宗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以及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等。1927年,胡适又得知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从伦敦影得敦煌本《坛经》。1930年,胡适将发现的神会资料編集出版,题为《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此后,日本又发现了另一种敦煌本《神会语录》,经石井光雄影印,题作“敦煌出土神会录解说”。后来日本学者又发现了刘澄序《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该卷内容与以前发现的神会语录大部分相同。日本还发现了京都堀川兴圣寺本《坛经》,祖本为北宋惠昕本。胡适通过对敦煌及日本发现的有关神会材料考辨,发现在后代的《传灯录》中名不见经传的慧能晚年的小弟子神会,在早期禅宗史上是南宗决胜北宗的关键人物。当然胡适的重要结论,如神会革命说,《坛经》为神会所作等说法,已经被新材料、新考证、新结论所取代,但胡适对敦煌禅宗史料的考证堪称精审,今日学者还不能全部推翻胡适的考证过程。如胡适根据仅见于敦煌写本《坛经》的一段慧能临终预言,断定《坛经》的作者是神会一系的人。这一结论被学界修正为敦煌本《坛经》乃神会一系所遵从、传习并有所增益。

又如对于伦敦发现的敦煌本《顿悟无生般若颂》1卷,胡适认为此为原题,后改作《显宗记》,通过比勘认为此颂为神会所作。胡适认为,《显宗记》有28祖之说,此文无,只有“传衣”说,“传衣”说自神会起才大力宣传。在此基础上,胡适以神会事迹为中心,上溯到研究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楞伽教义、苦修法门,下及南宗禅政治及历史地位的建构;揭示出神会继承了道生的顿悟学说,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以南宗顿悟法门革了北宗渐教楞伽宗的命,是南宗“北伐”的英雄。胡适的考证文章以敦煌材料为中心,以发现的神会和和尚的重要地位为圆心,以传世禅宗史料为参照,对古禅宗史考镜源流。虽然他的《中国禅学史稿》没有完成,但是他所作的相关章节已颇具规模。

敦煌写本《坛经》的重要价值,我们从现代研究佛学的大家几乎都非



S.5475《坛经》局部

常关注,并且几乎都有校本的情况可领略一二。那么敦煌本《坛经》和传世本《坛经》到底有怎么的区别呢?下面我们从最简单的一段文字解读入手,予以说明,只能是禅外说禅了。

现在通行本《坛经》,是元代僧人校编的宗宝本。对于什么是“坐禅”,宗宝本的解释是:“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而敦煌本《坛经》这样解释:“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去,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宗宝本认为:对外部世界的善恶美丑等

种种状况,都要做到“六识”(视觉、听觉、闻觉、味觉、触觉、心觉)不起,这就是“坐”。内心的本性丝毫不动,完全不受外界影响,这就是“禅”。而敦煌本则认为:人的六识随境而起,心念不去,这是人之常情,这就是“坐”。修行者能够控制、克制、消弭自己的六识之念,做到不乱,这就是“禅”。对于二者的差别,方广钊先生曾有一段生动的比喻说明:以明镜为例,在敦煌本看来,明镜本身是湛然清静,如如不动。无论外界什么景象,明镜都能照样反映,历历分明。但是任何外物,都像行云流水一样,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会给明镜留下什么痕迹,明镜依然是明镜。而宗宝本实际上是要去除外界映像,也就是要闭目塞听,行枯木禅。所以,宗宝本所表达的,是晚期禅宗神秀的思想,而不是早期禅宗惠能的思想。

二、敦煌道教典籍的内容和学术价值

六朝至唐宋,是我国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道教典籍。据王卡《敦煌道教文献收藏备览》的统计,敦煌遗书中保存的道教文献近 200 种,近 800 个写卷。有很多是传世本《道藏》没有收录的。这些道藏文书对研究南北朝隋唐道教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道德经》是道教的根本经典,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 30 多个写卷,10 余种注疏本,其中 8 种注疏是传世文献中没有的佚书。最受学者关注的是《老子想尔注》(S.6825),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有校证,从内容看是五斗米教的著作,反映了早期道教思想,十分珍贵。敦煌本《长乐经》(S.4610, P.3200)也不见于《道藏》,每节皆以“尊下长乐经”5 字开头,用五言韵语写成,残存 320 句,1600 字,犹如议论体五言长诗。

敦煌本《老子化胡经》也是一部道教佚经。老子化胡的传说在东汉桓帝时就产生了,西晋道士在此基础上撰成《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越陇山,经河西,涉流沙,入夷狄为佛,教化胡人。这显然是道教徒为攻击佛教而编造的故事。从唐代开始,统治者为了调和佛道二教的矛盾,不时禁毁《化胡经》,至元代至元二十五年(1288)禁毁以后逐渐失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 7 种唐人写本,有卷 1、卷 2、卷 8、卷 10 等。其中 P.2004《老子化胡经玄歌第十》全为五言诗,共 38 首,计《化胡歌》8 首,《尹喜哀叹》5



S.6825《老子想尔注》

首,《太上皇老君哀歌》7首,《老君十六变词》18首。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这38首全部收入《北魏诗》卷四,前有考证说:“逯按,出《三藏记集》。《老子化胡经》作于西晋王浮,以之攻击佛教。又《北凉录》云:《化胡经》晋时王浮道士所撰,一卷,后渐添成十一卷。据此,《化胡经》一书后世续有增益,正类其他道书也。而此卷《玄歌》按其所涉史实,知为北魏时代之作也。”逯文还具体考证是文成帝时代(452~465)的作品。

《化胡歌》8首,依时间顺序当为:《其八》写化胡前在幽谷岩石间求觅神仙圣公,得到元气真药。《其四》写登上华岳山,俯瞰中原大地,预言千年后这里将“白骨如丘山,尸骸露草野,流血成洪渊”。《其三》,离开华岳,须臾之间到了天庭,在那里受到盛情款待,“授我仙圣道,接度天下